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文件

隆政协(1992)6号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

关于扩建文史资料撰稿队伍会议情况的通报

一、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4月10日举行了扩建文史资料撰稿队伍(协商聘请撰稿员)会议。到会受聘的撰稿员33人,县志办、档案局、党史研究室各邀请一人,政协机关、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与会者11人。

会议由胡成章同志主持。他说:“为了加强文史资料工作,政协八届三次全委会上对加强撰稿员队伍建设进行了专题协商。我们决定聘请为撰稿员的到会同志,事先未能一一征求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配合。”他说:“我们县的文史资料工作卓有成绩,

1至8辑《隆昌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内容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史

学科四川正史的著作中被大量引用，计47处，此外《隆昌云顶寨史料》一书引用了89处，为数特多。”

李泽民同志说：“同志们到会整齐，热情很高，这是对政协文史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代表政协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的文史资料选辑内容为日本学者广泛引用，对提高我们隆昌县、隆昌县政协、隆昌县文史资料撰写者的知名度都有积极作用。”他说：“文史资料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文史资料撰稿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由赵嘉祯同志作关于隆昌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报告（内容见第二部份），继由陈钟麟、蓝长林、张汉儒等同志发言。

午后，分组讨论。分送了“征稿目录之三”和撰稿员聘书，与会同志充分发表意见之后，丁晓弟同志作了小结，他说：

“聘请撰稿员会议进行了一天，与会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对同志们给予政协文史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会上听取了李泽民、胡成章两主席对文史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听取了嘉祯先生的报告，又听了县志办陈主任、党史办蓝主任的讲解，对推动我们的文史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县政协的文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主要原因是有一大批优秀的文史撰稿员，有他们的高质量的

作品。

我个人还认为，文史资料的撰编工作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编纂的文史资料受到日本研究历史者的青睐，1至8辑和云顶寨专辑被日本金泽大学西川正夫广泛引用，可见我们的文史资料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

作为资料，我认为撰写时要求重视真实性、客观性，尤其讲究真实可靠，选题时则要求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文史资料的撰写，可以是一个时期的全貌，也可以是一事一貌，很多的点构成整个的面，有的则可能是一鳞半爪，乃至于是言家之言。

撰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倡导的，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要大胆地去写，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反映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最后，档案局吴晓英同志发言，她说：“我认为这个会开得很好，对推动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她说：“我们档案局（馆）要尽可能为撰写文史资料者查阅档案提供方便。”

二

隆昌县文史资料工作已有三十三年历程。在政协党组领导下，

通过两百多人的热心撰稿，大力支持，并得到县志办、档案局、党史研究室的有效配合，取得了一定成绩，按照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要在时限和内容上进行转移，这就要求扩建撰稿队伍，以适应新的需要。有些同志初次接触此项工作，有必要将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以及我们的工作情况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和介绍。

（一）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作用和方针

1.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团结、联系各界爱国人士，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提供素材的重要工作。它和县志编修工作、党史研究工作各自负担着不同的征集任务而又相互关连。

这项工作的意义极强，不但在大陆以内，也在大陆以外，我们的选辑和专辑还远涉重洋，紧扣着海外赤子之心。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郭成棠，原籍隆昌云顶系，他要写自己的生平而苦于对家庭情况所知不多，郭成俊同志之姊见到了《隆昌云顶系史料》，便叫她赴美留学的第二个儿子打电话“六舅”（郭成棠），他抵美以后，驱车六小时将书送到郭成棠手中，使郭成棠极为欣慰。

选辑第九辑（人物专辑）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了曾昭初的^的生平，在武汉工作的^的他长子益一极受感动，来函致谢。在各辑中出

过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后代见到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先人，且功过是非，持论公允，必将激励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从而更加增强建设四化的热情。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必须有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应以此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2、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以史为鉴，以文育人，以文会友。”古人说：“以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废。”我们历史地再现过去，好的、有益的，遵循不的、错误的、戒慎，对当前工作有好处。文史资料又可以作为乡土教材，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爱乡爱国之心。至于以文会友，如前面主席同志们所介绍，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国际友人，日本金泽大学西川正夫在他的“四川省隆昌县郭氏家族记忆——清末民国初年之乡绅”一文中，引用了我们的选辑、专辑内容计八十六处，涉及廖新、吴荫秋、赵嘉祯、马昭九、蓝家泰、蓝鸿章、郑嘉福、刘肖夫、谢国安、张隐秋、罗玉芳、陈能姚、陈永年、林贵华、梁鑑尧、冯金德、杨存道、周昌发、杨祥文、韩尤之、罗寰五、郭仁朋、许祖辉、曾令文等二十四人的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以文会友的具体事例。

3、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老人座谈会上倡导撰写文史资料，是立足于“抢救”史料，以后，作为一项政策措施，在内涵

的延伸、发展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1989年8月全国政协、省、市、自治区文史委主任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即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认为，一个爱国主义一个实事求是，是我们文史资料工作的灵魂。

（二）1959年以来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1、1959年4月周总理倡导撰写文史资料，我县于同年开展了此项工作，由郭韶九先生主持，号召社会人士学习组全体成员负担收集、撰写任务，到1964年，先后订出撰写文稿56篇的计划，写成20多篇，尚未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政协工作陷于停顿，文稿亦大部分丢失，仅存13篇。

1981年政协工作恢复之后，5月下旬四届十次常委会决定在召开五届全委会之前，先把文史资料工作抓起来。6月4日召开座谈会，拉开了工作序幕，11月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组（现称文史资料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征集、研究、编辑、出版、发行事宜。郭韶九先生带病工作，主持制定《隆昌县文史资料征稿总目》计115条，以后由蓝鸿章先生修订为征稿目录之二，现在的包括127个条目的征稿目录之三是杨存道同志按照新的要求斟酌拟定的。

1982年，由邓介八先生主持编辑，出版了隆昌县的第一本文史资料选辑。

2. 算至1991年底，编辑出版了《隆昌文史资料选辑》十辑，《黄复生资料集》、《隆昌云顶寨史料》两个专辑，共发行15,500册，载文265篇，计72.41万字。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诗词选《丹心集》和黄复生先生生平事迹报告会《会刊》未计入。历年所收文稿尚余56.65万字。

所出集子的统战影响，社会效益已略如前述。其中，对《隆昌云顶寨史料》历史学家阮瀛涛教授尚有较高评价。他认为此书“选题专一，典型，内容丰富，编排醒目，有史料与教育价值”，并肯定其为“我省各地文史资料选辑中较杰出的一部”，“对史学研究有用，对社会学研究亦有用”。

3. 选辑的交换单位97个，计省内77个，省外20个，赠阅单位17个，计省内11个，省外6个。

有三个发行窗口，一是中心街（原北街）《隆昌文史资料选辑》发行处，二是成都人民南路文史书刊社，三是重庆沧白路文史书店。

4. 本年计划编印选辑第十一辑，已选出文稿16篇，计73,700字，待召开文史资料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定后发排。

胡成章同志计划开辟一条文史工作新路子，使夏布史料直接为经济服务。与各经营夏布的公司搞文经合流，通过鉴古观今，古为

今用以促进隆昌夏布的生产和经营，为振兴隆昌经济助一臂之力。由于经费等原因，此项工作尚未落实。

5. 1988年10月我们在内江市、区县政协委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从选辑到专辑，为抢救谱新篇——我们是怎样组编云顶寨史料和黄复生资料集的”的发言。发言中，我们将历年的工作实践，体会总结成六句话，即是：“领导很抓是关键，依靠群众最为先，找人、命题双结合，打水要到水井边，思想工作做细致，自我完善后劲添。”

（三）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三个阶段的时限变化与内容转移

1959年第一次定出撰写时限，上限是戊戌维新，下限是建国前。

1983年，即第四、五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期间，将下限延伸至“文化大革命”前。

1989年北戴河会议决定，时限由建国前移至建国后；征集内容由政治、军事转移到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以及港、澳、台和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交流，民族地区史料的征集。

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建国前史料征集工作的延伸和发展，建国前的史料仍须做拾遗补缺的工作。

（四）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立足“抢救”

1. “抢救”观点自始至终贯穿于我们工作之中，我们的出版

物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就是“抢救”的结果。然而，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或者抓这就没抓那的原因，也造成了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郑嘉福、程尊汉两先生，他们为选辑撰写了一些文章，还定出了更多的撰写计划，可我们没有及时催稿，用原谅自己的话说是不愿逼逼他们，其结果，他们因病谢世，计划落空。郭希文先生是国民党的将军，他有很多经历，也写了不少东西，可我们没能及时去收集，他去世了。“百日烧灵”家里人竟一火而焚之了。这些都是我们“抢救”不力，落得个“人亡史亡”的痛苦教训。

2. 建国以前的史料要“抢救”，建国以后的史料也要“抢救”。史料的撰写是以“三亲”为主的。“三亲”，一是亲身经历之事，二是亲眼所见之事，三是亲历者、亲见者对我亲口叙述，是我亲耳所闻之事。建国初参加工作的同志，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人，都是花甲之年了吧。尽管大家都能健康长寿，但著书立说，总还是早些为好。

（五）文史资料撰写的要求和文稿的处理

1. 如前所述，文史资料撰写的要求是以“三亲”为主，但也不排除一些资料的整理。文史资料的撰写方式应该说是海阔天空的，志略而史详，志系统概括而史可以纵横捭阖，它既具有“三亲”的性质，也具有包容性、广泛性、综合性，因此在征集工作上又存在着开放性和广阔性。它不苛求全，只要求存真求实。

2、前面提到的“找人、命题双结合”是“因题找人，因人命题”相结合的意思，是郭韶九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们考虑了一些要征集的东西，由此而确定了一些被征集的人选。人们都有许多生活经历，可写的东西绝不限于某一件事，这就存在着一个因人命题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征稿目录，仅是提供参考而已，远远不止这些。为了反映一个事情的全貌，一人不行也可以集体撰写。

3、撰写资料时要求秉笔直书，如实地反映一个事情的真实情况。以前，叙述历史事件时，曾有人为“为尊者讳为尊者讳”困扰。如今，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可能顾忌更多，反映某些事情（比如某一次运动）时，惟恐涉嫌“抹黑”，只要我们存心维护党的形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人民利益，特别是立足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今年的二号文件精神办事，就不会出差错。我们“征集无禁区，发表要慎重”，可以共同作到这一点。

4、撰写文稿时文体不限制，但我们对刊载的文章要把好三关，即：一、政治关，它是能够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二、资料关，它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其真实性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三、文字关，无以文害义，导致曲解，可读性较强的。按照建档要求，来稿请用钢笔或毛笔书写，不使用铅笔、圆珠笔，不复写。

5. 撰文时需要查证资料，我们进行协助和提供服务。来稿酌付资料费，在选择上发表后酌付稿酬，由于经费紧缺，必然都是十分微薄的，这一点当能取得共识。

三

在4月10日的会议上，与会同志们从理论的高度充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蓝长林同志认为“我们在撰写史料时要突破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固于“文革”期间那种“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的模式”。陈钟麟同志谈到“述而不论”的原则，让“作者的观点在字里行间作自然而然的流露”。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如陈钟麟同志认为须挖掘得深一些，找有较大意义的，重要的、新款的题材来写，而细节上反复推敲，分寸要掌握恰当，因此建议“变独立作战为联合作战”。周道平同志强调“写文史不能搞创作，要重史实”。冯志荣、戴炳、许祖辉等同志提议“增加印刷数，扩大发行量，缩短出版周期，望能一年出上两本”。我们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将认真探讨，并促其实现。

政协隆昌县 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主题词： 扩编 文史资料 撰写队伍 会议情况 通报

／／